



中国当代语言学文库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青年重点项目（2013QN035）研究成果

汉学家理雅各 《中国经典》深度翻译模式研究

A Study on Thick Translation in James Legge's Rendering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尹延安◎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青年重点项目
(2013QN035) 研究成果

汉学家理雅各《中国经典》 深度翻译模式研究

A Study on Thick Translation in James Legge's Rendering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北京·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学家理雅各《中国经典》深度翻译模式研究 /
尹延安著.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7.4

ISBN 978-7-5192-2855-2

I. ①汉… II. ①尹… III. ①国学-英语-翻译-研究
②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8788号

书 名	汉学家理雅各《中国经典》深度翻译模式研究 A Study on Thick Translation in James Legge's Rendering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著 者	尹延安
策划编辑	王颖萱
责任编辑	赵黎黎
装帧设计	行言出版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邮 编	510300
电 话	020-84459702
网 址	http://www.gdst.com.cn/
邮 箱	wpc_gdst@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亚吉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2855-2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联系)

《中国当代语言学文库》

顾问委员: 裘锡圭 胡壮麟 陆俭明

桂诗春 沈家煊 戴庆夏

编委会

(按姓氏排序)

曹志耘	崔希亮	陈保亚	陈新仁	董燕萍
冯志伟	顾曰国	何 刚	何自然	黄国文
黄 衍	胡建华	姜望琪	刘丹青	林允清
李宇明	李经纬	梁晓波	刘大为	刘正光
马庆株	罗选民	潘悟云	潘文国	彭宣维
冉永平	沈 阳	束定芳	吴福祥	王铭玉
王洪君	王文斌	文秋芳	文 旭	熊学亮
袁毓林	杨信彰	张德禄	张 辉	张克定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青年重点项目
(2013QN035)研究成果

目录

M
U
L
U

绪 论	1
一、理雅各其人其译	2
二、研究综述	7
三、理论基础	17
四、研究框架	22
第一章 译者之外:理雅各文化身份分析	26
第一节 “索隐”传统与“文化传教”策略	28
一、从“利玛窦规矩”到“索隐”探究	29
二、儒家思想重要性之认识	35
三、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传教”策略	39
第二节 传教士理雅各的比较宗教文化态度	45
一、“孔子加耶稣”思想	46
二、基督教视阈下的儒教观	49
第三节 汉学家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	52
一、《中国经典》翻译规范	53
二、《中国经典》翻译标准	57
三、《中国经典》翻译评论	62

第二章 文本间性:作为互文形式的深度翻译	69
第一节 深度翻译显性互文形式	72
一、题解与注疏引述	74
二、文本训释	79
第二节 深度翻译隐性互文内容	92
一、隐含意义的解读	94
二、以史证《诗》与案语评述	97
第三节 文化传真与译本增值	104
一、文化概念意义传真	106
二、文化思维方式传真	110
三、文化整体风格传真	112
第三章 文化间性:作为阐释行为的深度翻译	116
第一节 语码转换的理解性	118
一、注释丰富性	119
二、宗教文化的类附比较	124
三、语码转换的灵活性	126
第二节 思想阐释的真实性	131
第三节 文化表达的适应性	135
一、直译法	136
二、意译法	138
三、比较法	141
第四章 主体间性:作为交际活动的深度翻译	143
第一节 深度翻译中的赞助人	144
一、中国士人王韬	144
二、其他中外人士	151

第二节 深度翻译中的宗教意识	154
一、译本中的耶儒对话	154
二、GOD 译名之争	158
第三节 深度翻译中的读者意识	164
一、人性化排版	166
二、特殊版本	170
第五章 文化传真:深度翻译中的中国文化形象	176
第一节 中国传统道德伦理	178
一、比较宗教中的中国传统典籍	179
二、儒家思想的批判	189
三、孔子形象的颠覆与重构	193
第二节 中国婚姻家庭关系	199
一、一夫多妻制	200
二、女性地位	203
第三节 中国政治宗教制度	208
一、殖民心态下的中国政治制度	208
二、基督教文化笼罩下的中国宗教	213
结 语	223
主要参考文献	228
附录一 理雅各简述及生平年表	240
附录二 理雅各汉学论著	263
附录三 《中国经典》各卷“绪论”目录	270
附录四 理雅各《中国经典》序言	275
后 记	291

绪 论

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 - 1897) 是苏格兰近代来华传教士, 是对中国典籍进行系统研究、翻译的西方汉学家之一, 在中国典籍翻译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最重要的译著是五卷本《中国经典》和《东方圣书》中的《庄子》《易经》等典籍译本, 综合反映着他的翻译水平与功底, 渗透着他的翻译思想、方法与创新。作为一名来华传教士, 理雅各的翻译体现出宗教思想指导下的宗教渗透翻译观、信本求真的翻译价值取向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翻译目的。深受儒家文化影响, 在《中国经典》每卷扉页上, 理雅各明确了“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的翻译标准, 体现了他强调等值翻译、不拘泥于字句、发挥译者能动性的思想。为此, 理雅各广泛采用了多种科学研究方法, 力求使译文达到与原文一致的效果, 包括对中国经典注疏的研究梳理、版本真伪考证、为英译本作多重索引等; 在考据、索引基础上, 主要使用了直译、意译、音译、注释、补充、省略、对比、造词等具体的翻译策略或方法。作为理雅各翻译思想和方法的表现形式, 译注、译评与前言、索引是其翻译创新点, 既体现了他在文献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创新, 又反映出他的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文化历史观。

《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是理雅各的代表译作, 在西方汉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对西方世界影响甚广。一百多年来, 其译本在英、美、日等国, 以及我国海峡两岸、香港等地不断翻印和再版, 据不完全统计, 有近 20 种版本。2010 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翻印了全套 1893 年《中国经典》译本,应该是最新的版本。^①

一、理雅各其人其译^②

理雅各 1815 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他的家庭信奉公理宗基督教教义^③,这种家庭环境深刻影响了他,奠定了他日后成为一名传教士的宗教基础。理雅各从小就具有一颗勇于探险、坚强执着的心,并从上中学时开始,就显露出非凡的语言天赋。他陆续学习了拉丁语、法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过人的资质、顽强的毅力与虔诚的信念正是理雅各学习汉语并进行中国典籍翻译研究的重要条件。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其他绝大部分传教士,理雅各除拥有过人的资质、杰出的才能外,还具有追求自由、平等、进步的思想。正是这样的思想使他具备了敢于挑战中国典籍研究与翻译的勇气与精神,让他在宗教传播、汉学研究 with 翻译实践中秉承兼收并蓄的相对开放、自由态度。

1839 年 7 月,理雅各受英国基督新教的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委派前往东方传教,1840 年 1 月抵达马六甲,接任英华书院院长。他来到东方后的生活非常紧张忙碌,在传教之余还要钻研汉语、掌管英华书院的教学以及管理英华书院印刷厂。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理雅各于 1843 年将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移至香港,得以

①没有另外说明的话,本研究以该版本为参考依据。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后文凡引述此版本时均省略为 James Legge. Chinese Classics[M], Vol I-V.

②详细生平简述见附录内容。

③公理宗是古老基督教新教的一支,坚持《圣经》的权威,相较于其他教派独具自由、平等、进步的特色。

进一步了解中国的语言与文化。理雅各抵华后,将汉语学习列为优先任务,以求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理雅各在传教过程中发现,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他逐渐意识到,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传教士,不能将基督教的精神强加给中国民众,而应该首先了解指导中国人行为思想的儒家精神。只有掌握这些开启中华文明的钥匙,来华的外国人才能成功地与中国人接触。他曾经在他的译著中明确地表达过这种思想:一个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如果他没有完全掌握那些中国经典,没有亲自调查那些中国圣贤们曾经涉足的思想领域的话,他就不适合他所担当的职责和正在从事的传教工作,因为在那些经典和那些领域中,可以寻找到中国人民的道德、社会和生活的基础。^①正是基于这种想法,理雅各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译经工作。

从1841年开始,理雅各把研究和英译中国经典作为其重要任务,在王韬等中国助手的协助下陆续将“四书”“五经”及其他多部中国典籍译成英文,并附以中文原文、详细脚注以及长篇巨幅的绪论。1861年至1872年间,香港伦敦传道会印刷所出版了五卷本《中国经典》译本。1861年《中国经典》第一卷出版,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同年,第二卷《孟子》出版;1865年,第三卷分《书经》《竹书纪年》两册出版;1871年,第四卷《诗经》两册本出版;1872年,第五卷分《春秋》《左传》两册出版。除了儒家经典,理雅各还翻译了部分道家经典著作,包括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秋水篇》和《太上感应篇》。同时,他还翻译了屈原的《离骚》。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致力于《楚辞》的翻译。他的译作涉及到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可以说理雅各是全面而系统地将中国典籍译介并传播到西方世界的第一人。

^①见《中国经典》第一、二卷前言。James Legge. Chinese Classics[M], Vol 1-II; VII.

1873年,理雅各先访问北京,参观了长城、颐和园和天坛,后前往山东登泰山,参观了孔庙、孔林,谒孔子墓,再从上海经日本、美国返回英国。返回英国后,理雅各于1876年—1897年受聘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任教牛津大学期间,理雅各陆续翻译出版了《道德经》《庄子》等中国典籍,并与《尚书》《诗经》《易经》《礼记》《孝经》等英译本一同被收入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主编的《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系列,被编为其中的《中国圣书》。他还撰写了《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中国编年史》等著作。

在中国典籍的研究与翻译过程中,理雅各逐渐意识到中国经典作品作为中国社会思想、道德、行为根基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也越发深刻地认识到了了解中国经典、翻译中国经典对在华传教工作的重要性。理雅各说:

儒教不同于佛教、婆罗门教,它和基督教之间不存在对抗性。它不像佛教那样无神论,也不像婆罗门教那样泛神论。不过它作为一个系统,其内容自然有东方局限性、时间局限性。虽然传教士们试图承认其好的地方,试图使用它又不滥用它,但是他们有时候难免显得欲将孔子从其高位上拉下来。他们做不到将福音作为上帝的智慧加以传播、将上帝的力量传达给需要被救赎的人、将上帝和耶稣的爱加以散播,同时又不谴责(中国人)罪恶感的缺失、中国圣人门徒身上虔诚的缺失。让他们以基督的精神去四处传教吧,不必挣扎或哭泣,带着温顺谦卑的心——我相信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容易。任何人都应该认识到必须不遗余力地熟习儒家经典,唯有这样在华传教士们才会完全理解自己的工作;他们越发小心地避免驾着马车粗鲁地从夫子坟墓上碾过,就更有可能很快地看到人们发白

内心地信奉耶稣。^①

理雅各认为传教工作可以找到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而不是横冲直撞地与当地异教发生冲突、对异教所信仰的先师大加贬低^②。在理雅各看来,熟习中国经典是传教工作得以有效推进传教工作的重要路径,能更好地通过中国经典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有利于传教工作的开展。但《中国经典》翻译不可避免地带着传教目的,因为理雅各将翻译中国经典活动本身视为一种虔诚的侍奉上帝的工作,而且其翻译工作以不影响传教工作为前提:在献身于此期间,他也坚定不移、毫不动摇

①原文:Confucianism is not antagonistic to Christianity, as Buddhism and Brahmanism are.

It is not atheistic like the former, nor pantheistic like the latter. It is, however, a system whose issues are bounded by the East and by time; and though missionaries try to acknowledge what is good in it, and to use it as not abusing it, they cannot avoid sometimes seeming to pull down Confucius from his elevation. They cannot set forth the Gospel as the wisdom of God and the power of God unto salvation, and proclaim the supreme love of God and of Christ, without deploring the want of any deep sense of sin, and of any glow of piety in the followers of the Chinese sage. Let them seek to go about their work everywhere—and I believe they can do so more easily in China than in other mission field—in the Spirit of Christ, without striving or crying, with meekness and lowliness of heart. Let no one think any labour too great to make himself familiar with the Confucian books. So shall missionaries in China come fully to understand the work they have to do; and the more they avoid driving their carriages rudely over the Master's grave, the more likely are they soon to see Jesus enthroned in His room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见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M].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37 - 38.

②原文:they might find a more excellent way than to dash too much into collision with the existing heathen religions, and speak too bitterly of their great teachers. 见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M].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36.

地将直接的传教工作视为首要任务,并将主要精力用于传教工作。^①湛约翰(John Chalmers)曾给理雅各写信说:

我越来越相信你做的事情对我们的传教工作的重要性。我们要把《中国经典》用到基督教传教上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很不了解中国文化。我要在传教条例上增加一条:要到中国传道就要对中国古代诗人、哲学家的语言有所了解。^②

因此,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和传教士,理雅各具有深入了解中国经典并将其深刻传达给西方传教士和西方世界的真诚意愿。艾约瑟(Dr. Edkins)认为,理雅各经过长时间努力而形成的译本为传教士和中国语言与文学的研习者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提供了大量可供欧美人士正确认识中国的资料,包括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约束学者与贫民的准绳和每个人行为举止的规矩,这些关于中国的大量事实能帮助欧洲和美洲的观察者对中国做出正确的判断。^③同时,理雅各将中国经典翻译工作作为推进传教工作的重要目标,在25年时间里努力学习汉语、钻研中国文献,将此期间积累的汉学能力悉数付诸中国经典翻译工作,并相信自己的中国经典工作将惠及传教工作:

我在这一工作中充分利用了自己25年刻苦钻研所得的汉语学术能力。这一工作是必要的,藉此,全世界将得以真正了解这个伟大的帝国,同时,我们的在华传教工作也能以对中国足够的了解为基础,这

①原文:While he was engaged in this work he made it a point, from which he would not deviate, to regard direct missionary labours as demanding and receiving his chief attention. 见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M].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38-39.

②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M].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43.

③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M].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38-39.

样才能收到长久效果。我认为全面翻译、注释、出版儒家经典对将来的传教工作将大有裨益。^①

二、研究综述

关于理雅各及其典籍英译的研究,呈现出英美汉学界、港台学术界和中國大陸学界三大阵营各具特色的局面。就整体而言,英美汉学界侧重从理雅各生平角度讨论其汉学研究 and 典籍翻译经历,港台学者则较深入地从宗教、文化交流角度探讨了理雅各的翻译问题和学术思想,而大陆学者更多地集中在外语学界,侧重于理雅各译本的个案或比较研究。

英美汉学界最早的理雅各研究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期的《中国评论》杂志上,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湛约翰(John Chalmers)等汉学家对理雅各的中国典籍英译本进行了或褒或贬评论。最全面的理雅各研究当属诺曼 J. 吉尔多特(Norman J. Girardot, 2002)和费乐仁(Lauren F. Pfister, 2004)分别出版的专著。前者讨论了理雅各前半生的传教士和汉学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经典的研究和翻译;后者从现代阐释学的角度对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中体现的宗教、学术思想做了深入的分析,评述了理雅各作为翻译家的文化身份形成过程。此外,西

①原文:I have brought to the work a competent Chinese scholarship, the result of more than twenty and five years of toilsome study. Such a work was necessary in order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really know this great Empire and also that especially our missionary labours among the people should be conducted with sufficient intelligence and so as to secure permanent results. I consider that it will greatly facilitate the labours & future missionaries that the entire books of Confucius should be published with a translation and notes. 引自 Lindsay Ride 为理雅各《中国经典》英译本第一卷所作 Biographical note。

方学者安妮·比勒尔(Anne Birrell, 1999)和戴维·霍尼(David Honey, 2001)从汉学研究角度对理雅各中国经典英译进行了宏观讨论。因理雅各在华期间主要生活在香港,香港学者从宗教(黄文江, 1996)、语言(单周尧, 2000)、文化(刘子濬, 1994)等各个方面对他从事的翻译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此外,台湾学者张上冠(2004)通过理雅各、韦利、高本汉《诗经》英译本的对比研究,论述了中国典籍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对理氏翻译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大陆学者的理雅各研究起步稍晚,在2000年后发展较快,以外语界学者为主,注重译本研究,涉及理雅各中国典籍英译中的语言转换机制、译文质量、译文文体风格等方面;而中国文学界的理雅各研究则凸显文学、宗教学、阐释学等跨学科融合。(1)理雅各中国典籍英译及其学术地位的整体介绍 挖掘译者在英译中体现的文化背景和学者型翻译特点(段怀清, 2005/2006;王辉, 2003;马祖毅, 2006);(2)理雅各译作语言特色研究,主要侧重于理雅各和其他译者的译本比较研究,且集中于《论语》《尚书》《诗经》译本分析,认为理雅各译本注重对中国文化的保留与显化(楚至大, 1999;刘重德, 2001;岳峰, 2004;姜艳, 2010;陆振慧, 2010;李钢, 2012);(3)理雅各翻译策略和翻译文体特色研究,以理雅各某一译本为例分析理雅各直译、加注等翻译策略的运用及其体现的“厚重式”翻译特色(甄春亮, 2001;王辉, 2004;周小玲, 2011);(4)基于理雅各译文所采用的义理系统分析,提出理雅各对中国文化典籍的思想、文化、文学和意象四大阐释是翻译的基础(程钢, 2002;沈岚, 2013;薛凌, 2014);(5)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为中心论证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价值,通过梳理中西“经文”之互译、互释、互训的实践,提出中国经典翻译能够真正成为中西之间的思想对话,促进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杨慧林, 2011、2012;耿幼壮, 2014)。此外,有关理雅各译文出版方面的研究也拓展了理雅各翻

译研究的领域(刘重德,1994;秦颖,1999;王辉,2003)。

就整体而言,我们可以看出理雅各翻译研究现状的内外有别。国外和香港的研究集中于历史与宗教哲学学界学者,主要从历史和宗教的角度出发,充分结合历史背景来评论译文,使读者可以看清译文产生的背景并理解相关的哲学理念。但由于较少涉及具体的翻译文本分析,很难从翻译的角度深入到语言内在的机制,未能构建理雅各译文语言风格的理论体系。大陆的研究主要关注具体的翻译文本,虽然不乏经典之作,但研究面相对较窄,译本分析集中于《论语》等少数几种,对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不够深入,主观评价比较突出,难以解释理雅各的翻译价值取向及其影响。就研究方法而言,现有的研究方法单一,除少量借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外(周小玲,2011),主要零星的译例分析,难免以偏概全,缺乏系统的、科学的方法,所得结论也就缺乏足够说服力。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如下四方面加以分析。

1. 理雅各作为传教士汉学家的研究

国内外均有学者结合传教士研究解读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实践,其研究大多在生平介绍的前提下对理雅各的传教士生涯与汉学研究做较为全面介绍。理雅各的女儿海伦·理雅各(Helen Legge, 1905)的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详细介绍了理雅各的传教事业、成就及其中国经典翻译的动机、理念与过程,指出理雅各视中国经典文本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生活、伦理的重要体现,并建议将理解和翻译中国经典作为在华传教工作的重要基础。该书虽没有解读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中的跨文化诠释思想与方法,但提供了大量帮助人们了解理雅各中国经典西传的动机、理念等珍贵资料。

吉尔多特(Girardot, 2002)题为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的专著对理雅各的传教士生涯和汉